

阿基米德的支點

但昭偉

近代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凌駕其它文明（如儒家文明或回教文明），關鍵之一在於它的科學精神和由之而生的科技。科學和科技的要點就在於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自然世界、人文世界乃至人的內心世界），乃至操控我們所處的世界。至於理解之後要做什麼、操控的目的為何，那就不是科學家和科技人員的專長了！儘管科學及科技有它的限制，也不必然的會帶給人類幸福，但它們起碼在解決困擾我們的許多問題上（如飢荒、經濟發展…），會比其他方面要管用得多（如求神問卜）。

我以上所說的，根本就是常識，但這常識似乎在教育問題的了解與解決上沒有派上用場！就以「體罰」為例吧！這麼多年來，教育官員信誓旦旦的要消除體罰（他們的確也採取了具體行動，如校園零體罰），學者專家和教改人士也不斷的要求老師不要體罰，但我們對體罰的了解又有多少？先假設我們對體罰的定義沒有什麼歧見，在這假設之下，我們可以問：體罰發生的原因究竟為何？體罰在國中和國小發生的頻率為何？體罰在國民學校中各年級發生的頻率為何？各縣市（甚至各鄉鎮、各校）發生體罰的比率為何？是什麼樣的老師容易體罰學生？是什麼樣的學生容易被體罰？在什麼地方最容易發生體罰？在什麼時候（活動）最容易發生體罰？家長、老師和學生對體罰的態度為何？…

除非我們了解上述的問題，否則有效的解決方案就不容易發生，期盼體罰能在短期間內能合理的解決也就會是緣木求魚的事！事情還不僅止於此呢？假如我們真要解決校園體罰的問題，我們還要問：在掌握了有關體罰發生的原因及實徵性的相關數據後，我們打算在幾年之內解決這問題？每年以什麼樣的速度來消滅體罰？十年計畫？二十年計畫？能完全讓體罰消失嗎？假如不能，什麼樣的發生頻率是我們可以勉強接受的範圍？

根據我個人的了解，有關對體罰的了解，我可能還停留在相當粗淺的階段，相關的數據也都沒有掌握，無怪乎我們採取的解決方案就不是那樣的科學，往往

流於道德勸說或法律威嚇。假如體罰問題是如此，教育中的其它問題又如何呢？我們對那些問題的基本性質掌握的情況又如何呢？能令人滿意嗎？如不能令人滿意，「友善校園」會自動冒出嗎？說到這裡，讓我們來檢討我們國家的教育研究，特別值得提的有兩點。

第一，座落在三峽的國家教育研究院，已籌備多時，但迄無法來籌備、滿載運作的跡象，這是件令人不解的事。爲了發展經濟，台灣有規模的經濟研究院起碼就有二間，中研院也設有經濟研究所，但反觀與經濟發展、乃至於社會整體發展有密切關係的教育，卻沒有一個有規模的研究機構，中研院也似乎視教育研究爲雕蟲小技，進不了學術的殿堂！雖然一些綜合大學、各師大及師院設有相關的系所，但這些系所的老師負有太多的任務，能夠專心做研究的人並不多。一所有規模的教育研究機構是件迫不及待的事。延遲懸宕的結果只會讓我們無法妥適的了解教育現況及教育問題，受害最深的則是社會整體。衡諸教育研究所耗費的資源相當不高，國家教育研究院的正式成立（乃至避免成爲教育部單位整併後的雜牌機構），中研院教育研究所的籌備應是刻不容緩的事。

第二，政府各機構可投注在教育研究上的經費也絕不能總是杯水車薪，但其研究的成效如何則值得推敲。據我了解，在教育圈子裡，掌握教育行政資源的人通常與教育學術圈子裡的人都有「關係」，在這關係之下，教育行政機構所掌握的研究資源，就會像是做人情一樣的順手給與他們有關的學術界人士，在這過程中，委託的單位通常不太會計較承接研究工作的人是否真的有能力或有時間來完成那研究，他們在意的可能是對方能不能及時的（在會計預算年度內）寫出一份與委託單位立場約略符合的東西。在這樣的辦事手法中，我們在第一步就不太可能期待如此研究的品質，再加上教育學術圈裡的人通常忙碌異常，也不太可能全心全力的投入研究的主題，委託機構也沒有能力或時間來評量那些研究報告的水準及可行性…。被束之高閣的研究報告、交差了事的報告、適合委託單位的報告於是比比皆是。

假如我們不了解這個世界，我們如何能夠來掌握這個世界？阿基米德曾說：

「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舉起整個地球。」我們有沒有找到教育活動的支點？我們有沒有試著去找這支點？我們教育研究機構的規模及運作方式能不能讓我們去找到這樣的支點？